

中国现代 文学词典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CID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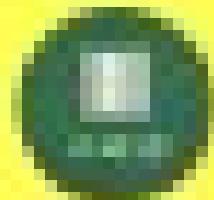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词典

CHINAMODERN
LITERATURE
DICTIONARY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现代
文学词典

● 第四卷 ●

● 诗歌卷 ●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Cidian

● 徐迺翔 主编

●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词典

(诗歌卷)

徐邁翔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4 印张 插页 3 534 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2,400 册

ISBN 7-219-01591-7/I·456 定价：6.65 元（平）

ISBN 7-219-01592-5/I·457 定价：10 元（精）

编 辑 顾 问

贾植芳 钱谷融

主 编

徐 遷 翔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卢正言 阮 同 陈子善 姚春树
钦 鸿 建 文 徐 遷 翔 鲍 晶

本卷责任编委

鲍 晶 钦 鸿

本卷主要编撰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玉树 王宗义 刘宗武 刘福春
孙玉蓉 张宜雷 陈玉麟 欣 文
周绍曾 封世辉 赵沛霖 钦 鴻
闻 彬 徐 型 徐 遷 翔 唐解放
韩之友 鲍 晶

其他参加编撰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紫平 卢正言 刘士杰 肖 凌
何兰玉 张效民 陈子善 施也频
顾智敏 郭武群 黄 然 黄万华
慎 言 穆 煊

序

辞书作为工具书，它是高密度、大容量的知识载体。对于专业辞书说来，它必须为读者提供具有规范性和权威性的有关某一专业或学科所应具有的知识资料，尽到传授本专业或学科的基本知识概念和释疑解惑的功能。因此，它的编纂工作必须以实用为目的，并以高度的科学性和知识性结合与统一为其最高标帜；同时，也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不为一时的环境变异而成为明日的黄花。象我国东汉时代编就的字书《说文解字》，成书虽已二千多年，至今仍然是权威性的辞书；成书于1771年的《英国百科全书》，历时二百年而不衰。反之，而成书于1962年的我国第一部小百科全书式的修订旧版的《辞海》初稿本，因为它成书于极左思潮盛行年代，而存在严重的缺陷，有背于辞书学的本旨，它的昙花一现式的存在，已经作为一种历史的教训，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建国以后，随着高等院校建立专业教研室和开设专业课程，正式建立了起来。但由于它和现实关系最为贴近等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因此，正如茅盾同志所说，由于“文化大革命前，……文艺界始终动荡不安，……后来‘四人帮’的十年清劫，又把所有的作家赶进了‘牛棚’，几乎全部作品都送进了废品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序》）它作为一门专业学科，正常化的学术建设事业，包括资料建设事业，只有在粉碎了“四人帮”，我国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克服了极左思潮以后，才迈上了正轨，呈现出全新的局面。所以，要编纂一部资料信息丰富、词条详尽确实、观点客观公允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

补足我国辞书建设中的这一大缺门，也只有这时，才具备了成熟的历史条件。

1978年，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倡议和主持，结集了全国六十多个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业力量，召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会议，制定了规模空前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建设规划，决定以分工合作的方式，着手编纂和出版三大门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系列性丛书，后来它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眼下这部由徐迺翔同志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就是在这套资料丛书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它的编写人员，大都是以参加这套丛书编写工作的人员为班底组织而成的，这就天然地赋予它的绝对优势条件，因为这些同志，都在原始资料的海洋里浮沉了三、四年，摸遍了各该专题领域里的角角落落，而且都已出了自己的成果。同时，这些同志，又多值盛年，他们经受过历史风暴的严峻锻炼，善于汲取历史中的积极因素和总结它的消极影响，因而，又能以今天的思想水平，审视历史，面对时代。有人说，文学创作要有火山般的热情，辞书著述要有雪峰般的冷静思考，在他们身上正蕴含着这样精神素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结合，充分地保证了这部开创性大型辞典的编纂工作在质量上的应有要求。

从这部词典本身的编辑体例和成果来看，可以说，它收罗宏富，视角辽阔，词条面宽广，足以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三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风貌。全书共分为六部类，举凡重要的文学运动、论争、思潮、事件，文学社团流派，作家（包括评论家），作品（包括作品集、有代表性的名篇、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主要的文学报刊，文学体裁（包括各种文体发展、演变进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评论文章等），靡不网罗殆尽，全收眼底。对于过去研究工作或资料收集工作中尚未接触或接触不够、不深，而为现代文学这一历史范畴内不应缺少或薄弱的环节，如鸳鸯蝴蝶派文学，老苏区及解放区文学，东北沦陷区文学，上海“孤岛”及抗战时期敌占区文学，港台文学，马华文学等，以及过去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受到疏忽或不公正待

遇，因而被历史尘沙淹没无着或半被淹没以至评价失之偏颇或扭曲变形的运动论争、社团流派、作家作品、文艺报刊等类，这里都能从深入发掘第一手资料出发，经过搜集、整理、鉴别、弥订工夫，披拣摄取，澄澈提炼，撰成词条。或钩沉故实，拾遗补缺；或校正失误，更易旧说。即或对于过去的研究和资料成果，他们也一一查对原件，进行了核校补正。在释文上，更能排除多年来积淀于人们头脑中的“左”的条条框框，做到言必有据，注意观点与材料的结合，既避免了不反映观点的盲目性的资料堆积，又能克服只有观点而缺乏实际知识的空洞说教。对于一切有争议的人和事，又能取公允的审慎态度，作出尊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的描述和评价。同时，又善于在词条设置和事实叙述中，保持应有的倾向性，并能把革命的、进步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主流力量，摆在应有的历史地位。

因此，作为一部专业知识广博、资料精确、释文谨严、行文简明、体例严密而又具有实用价值的专业辞书，它应该是一部有历史意义的学术著作，正足以填补我国辞书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缺门。为此，我非常乐意把我的同业同志们这部心血产物推荐给广大中外读者和研究家，因为它对初入此门的从业者来说，足以充当一个合格的业务向导。手此一书，无异身入文山艺海，实有指津引谜，左右逢源，无师自通之便；对于研究家说来，它也可备为咨询之用，因为它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这门专门学科的知识总汇和资料仓库，它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总结性的结集。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文化形态的艺术反映和表现，因此，对于治中国现代史的学者说来，它又啻是一部内涵丰富的思想资料仓库，应有其特有的参考意义和使用价值。

人类编纂辞书，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我国第一部辞书《尔雅》，成书于西汉，距今已二千年左右，我国也是世界上编纂辞书最早的国家之一。进入本世纪下半叶，人类面临“知识爆炸”的时代，全

世界范围内各类辞书更是层出不穷，呈现出一派繁花似锦的繁荣局面。同时，五十年代以来，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增强，东西方汉学界也更注意于“中国学”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也作为“中国学”的分枝，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出现了一代一代的专业学者。仅就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辞书来说，据我所见，日本河出书房1955年就出版了竹内好、冈崎俊夫监修、中国文学研究会编的《中国新文学事典》，高文堂1978年出版的藤野岩友等编的《中国文学小事典》，大修馆同年出版的迈藤春雄编的《中国学艺大事典》，捷克丁·普什克1974年在纽约出版的《东方文学辞典》等，也都收有大量有关中国现代文学词目，至于包括中国现代文学词目在内的国外各类百科全书、文学辞典，我也多有所接触。我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故乡，现在徐迺翔同志主编的这部五卷本《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的出版，不仅填补了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巨大空白，它也应该说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同类出版物中的后来居上的权威性存在，因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我们最有发言权。我相信，随着这部专业辞书的出版，不仅将引出我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新高潮，有助于我们研究和教学工作质量的提高和专题研究的开拓，对于已成为国际性的东西方汉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说来，他们也必然有如获至宝的感觉，有助于他们解决由于资料的缺乏和不足在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中所存在的那些困难和局限，为促进世界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加强国际间的学术文化交流，也将是一个很有益处的贡献。

贾植芳 钱谷融

1987年4月下旬于上海

编 辑 凡 例

一、本书总称《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共分为：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综合卷等五卷。

二、《词典》的时间界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词条内容叙述需要时，不受此限。

三、《词典》坚持唯物主义观点，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重视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以及有过较大影响的史实材料。

四、《词典》注重内容的科学性、知识性和稳定性。词条的设置和内容的叙述，力求翔实准确。同时，尽量做到客观、如实地介绍有关历史情况和材料。

五、《词典》各分类的词条设置，力求突出重点，照顾全面；以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代表性的史料为重点，注意过去被忽视和受到不公正的冷落，甚至目前还是空白点的史料；同时照顾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区，以及不同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运动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和期刊副刊等。

六、各卷所收词条包括：文学运动·论争·思潮和事件；文学社团和流派；作家；作品集；作品名篇和著名人物形象；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文学种类和体裁（附有关评论文章）等。

七、《词典》词条的排列。文学运动·论争·思潮和事件，按其发生和出现的时间先后为序排列。作品集、文学作品名篇和著名人物形象、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等，按其出版、发表和创刊时间先后为序排列。作家部分，按姓氏首字笔画为序排列。

八、《词典》各分卷词条内容的交叉和参见的处理。兼有或涉及多种文体的史料，多数在综合卷列条，少数有重要影响和多方面成就，进行过多种文体创作的作家，按其为主者，在相应分卷介绍生平经历、文学活动和为主文体的创作情况，同时在另一分卷里仅介绍本文体的创作情况。作家参见词条原则上以一处为限。少数一词多义的文学体裁和种类词条，仅在本分卷参见。

九、《词典》的内容广泛，撰稿人众多，情况各异，编者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当和失误之处。我们真诚地欢迎有关专业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及时批评指正，以便分卷合成再版时予以订正。

1987年4月

诗歌卷编写说明

一、本分册是《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的诗歌分册。根据《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的编写体例，本分册分工负责编写有关中国现代文学新诗方面的词条，分为以下八个部分：（一）与诗歌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文学运动、论争、思潮和事件；（二）主要的诗歌社团、流派；（三）诗歌作家；（四）诗歌作品集；（五）有代表性的诗歌名篇与人物形象；（六）偏重于诗歌的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七）诗歌体裁分类；（八）诗歌理论评论名篇。

二、本分册所撰的诗词歌条，包括叙事诗、抒情诗、散文诗、诗剧、朗诵诗、科学诗等多种体式，力求尽可能全面反映中国现代诗歌多样发展的历史风貌。

三、根据《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编写体例，本分册大部分词条均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作家部分以姓氏首字笔画为次序编排。

四、本分册主要由天津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南通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部分同志撰写。鲍晶主持本分册的撰写工作并与钦鸿对本分册词条进行初审，主要编撰成员有王玉树、王宗义、刘宗武、刘福春、孙玉蓉、张宜雷、陈玉麟、欣文、周绍曾、封世辉、赵沛霖、钦鸿、闻彬、徐型、徐迺翔、唐解放、韩之友、鲍晶等18位同志。其他编撰成员不一一列举。所有词条后面，都署撰写人姓名。

目 录

序.....	贾植芳 钱谷融(1)
编辑凡例.....	(5)
诗歌卷编写说明.....	(7)
词条正文.....	(3—399)
词目分类目录.....	(403—431)

运动·论争·思潮·事件

(按发生和出现的时间为序)

“五四”新诗运动 有着现代色彩的新诗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诗运动的兴起，是由于时代的需求，诗歌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受到外国诗歌的影响。新诗运动要求以白话的新体诗取代文言的旧体诗，从“诗体大解放”中谋求诗歌的新生与繁荣。中国的文言旧体诗发展到晚清，盛行着拟古的形式主义诗风。不少的旧诗人，在语言和意境上模仿古人，无病呻吟，以用字艰涩用典冷僻，专讲音韵格律卖弄求新，使诗歌远离时代人生，严重地阻碍着诗歌的发展。戊戌政变前后，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曾倡导“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以新名词或流俗语入诗，以旧风格表现新意境。诗界革命虽然没有彻底摆脱旧诗的束缚，但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对于“五四”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是新诗的产床和摇篮。该刊创刊后就酝酿文学革新，编者陈独秀在介绍西方文艺思潮时，认为我国文艺应脱离古典主义，趋向写实主义。1917年1月，胡适在该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依据文学历史进化的观念，反对模仿古人，主张以白话作诗作文，实写社会情况。随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要求创造通俗的抒情的写实的诗歌。钱玄同在《寄陈独秀》中，也赞同以白话作诗和不用典故。1917年5月，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不仅支持胡适等人的主张，还提出破坏旧韵重造新韵，采用自造或输入的办法增多诗体，“并于有韵之诗外，别增无韵之

诗”。随后他又发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强调诗的真实性，批评旧诗坛已成假诗世界，主张诗人应在自然人生中探求真实。这些新诗运动的前驱者，都反对浮华颓败的诗风，要求冲破文言旧体诗的种种束缚，以接近口语的白话作诗，表现来自自然人生的真情实感，使诗与时代人生紧密结合。1918年8月，胡适在《答朱经农》里，明确提出“诗体的解放”是创作白话诗的大宗旨，要求人们“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统统推翻”。以后，他在《我为什么要写白话诗》、《谈新诗》等文里，进一步说明有了诗体的解放，“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情感，方才能跑到诗里去”。随着新诗革命理论的传播，创作白话诗的人也日益增多。1917年2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8首白话诗，6月又发表他的白话词4首。但这些白话诗词还有着浓重的旧诗词影响。1918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新诗共8首。此后，该刊陆续发表李大钊、陈独秀、唐俟（鲁迅）、周作人、沈兼士、陈衡哲、林损、俞平伯、常惠等人的新诗。除《新青年》以外，《每周评论》、《新潮》、《少年中国》，以及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北平《晨报副刊》等报刊也陆续刊出新诗。尽管守旧势力对新诗攻击嘲讽，但是创作新诗已蔚然成风。在诗体大解放的号召下，新诗日益摆脱旧诗的影响，诗歌体裁日益增多，表现方法也日趋多样。在内容上，新诗有着新的思想，富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在文学革命中，新诗最先取得创作的实绩，成为各种形式文学变革的开路先锋。它从实践上证

实了白话可以做为“韵文的利器”，
为白话文学取得“正宗”的地位奠定了根基。
(鲍晶撰写)

诗是“平民的”还是“贵族的”论争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反对用文学来粉饰生活，要求文学与时代人民紧密结合。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首先就要求“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1919年1月，周作人发表《平民文学》，指出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区别，在于是否具备普遍与真挚的精神。平民文学是“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不必去写英雄的伟绩，才子的风流。平民文学还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不必雕章琢句，而要有真意实感。在民主主义的文学思潮里，以平民生活题材入诗，重视写实和白描，强调诗的具体性和明白性，就成为诗坛的风尚。1920年，康白情发表《新诗底我见》。文中认为诗要言之有物，但是没有美也不成诗，所以诗是“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调合而成。诗的创作和鉴赏，都是在人生“静观”的时候。大多数人役于人生的奋斗，少数人才有条件进行诗的创作和鉴赏。这证明诗的起源和诗的功用，都是贵族的。所以“‘平民的诗’，是理想，是主义，而‘诗是贵族的’，却是事实，是真理。”他认为“诗尽管是贵族的，我们还是尽量要作平民的诗”。1922年1月，俞平伯发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他受到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的影响，反对艺术以美为鹄的，主张艺术应当引人向善。他认为诗人的伟大，不在于心境的陆离光怪，不在于

有特殊的幻想和神思，而在于能表现普遍的情感，写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那些只能感动少数人，“虽在一方面看价值很高，却没有普遍的价值”的诗，是贵族的诗。而那些能感动多数人向善的诗，才是好诗，“好的诗应都是平民的，且没有一首不是通俗的。”他主张创作平民的诗，“不但是材料须采取平民底生活，民间底传说，故事，并且风格也要是平民的为好。”他提出“诗的还原论”，认为诗歌原属于平民，歌谣就是没有经过“化装游戏”的原始的诗，而诗的贵族色彩是后加的，妨碍着诗的普及。他主张“推翻诗底王国，恢复诗底共和国”。同年2月19日，周作人发表《贵族的与平民的》，将文艺上的平民精神，解释为叔本华说的“求生意志”，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贵族精神则是尼采说的“求胜意志”，要求无限超越的发展。他认为“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26日，他又发表《诗的功用》，认为诗的功用难以计算，“善”没有固定的标准；文学家虽然希望民众了解自己的艺术，但也不必强使自己的艺术去迁就民众。他对俞平伯“好的诗的功用是能深刻地感动多数人向善”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5月27日至29日，梁实秋发表《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他反对艺术的鹄的是善，主张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他认为诗中最宝贵的材料，不是普遍的情感，而是特殊的幻想和神思。“诗人的家乡离这‘血和肉’的社会远得很”，而是在记忆和想象里，替人们祝福。他认为诗是贵族的，不可能使人人都了解和感动，更不能人人会写。诗人不能为使众人了解而写诗。一首